

骏马奖作家观察(十八)

西藏日常书写的诗性建构

——尼玛潘多创作观察

□赵 丽

从1990年代中后期步入文坛以来，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笔耕不辍，已为文坛贡献出多部优秀的作品。尼玛潘多的文学创作是从散文开始的，2001年出版的散文集《云中锦书》(与他人合著)，书信所述人事都真实可查，家人、友人、英雄故事、历史掌故等无所不谈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家国情，情感真挚浓郁。尼玛潘多文学创作的精神脉络，在这部散文集中都有迹可循。2010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紫青稞》，标志着尼玛潘多创作风格的初步形成。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，“尽可能物质化、细致化地呈现出西藏这样大的一个历史进程”。2022年12月，短篇小说集《透进病房的阳光》出版，意味着尼玛潘多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学故乡：文学的“协噶尔村”。同年，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在高原》出版，与第一部长篇《紫青稞》相比，小说有了纵深的时空感，于2024年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。

经过三十多年的文学跋涉，尼玛潘多形成了明晰的创作风格：以西藏日常写实为图景，反映时代变迁的讯息，通过书写小人物，致力于民族精神的挖掘和丰富人性的探查。

以日常生活为时代镜像

尼玛潘多的创作关注西藏的发展变迁，作品中体现出深切的家国情怀。这在当代藏族文学中并不鲜见。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的藏族文学，一直秉承着重大主题叙事的写作传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尼玛潘多的创作从微观化的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切入，以日常生活的书写为镜像，呈现西藏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。她笔下的西藏切实可感，充满烟火气息，充实了宏大叙事下普通百姓鲜活的生活肌理，又不同于高蹈式神秘化西藏的书写，为“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”探索出一种写作方法。

《紫青稞》以阿妈曲宗的三个女儿桑吉、达吉、边吉因各种原因由走出大山的人生际遇为主线，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，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，西藏农村的发展变化。《在高原》围绕姑妈家族四代人扎西次仁、旦增、朗杰多吉、白玛措吉人生命运的轨迹，书写了从清末直到新时代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。他们家族四代人在西藏扎根并不断延续，展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。小说集《透进病房的阳光》通过“协噶尔村”的一系列人物，折射出西藏乡村的发展变化。

尼玛潘多的创作表露出积极、正向的价值立场。她在《时代成就我的文学梦》一文中说：“切身经验告诉我，个人的命运永远和国家的发展轨迹紧密相连。”“我为自己能经历和见证这个美好的时代而庆幸和自豪。”早期散文集《云中锦书》中的篇章，如《江孜宗山保卫战》赞美了藏族军民誓死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，《罗布次仁，一个大写的人》抒发了“祖国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，我们作为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只有把自身价值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，实现其自我价值，才称其为一个大写的人”的深切感受。散文《是远方，更是故乡》讲述了感人至深的援藏故事，抒发了深厚的民族感情，阐释了同呼吸、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尼玛潘多一直在以文学创作展现着深厚的家国情怀。

民族精神气质的挖掘

尼玛潘多的文学创作扎根于藏族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，以人物命运为关注点，其笔下人物的行为心理、为人处世、命运抉择都渗透着民族文化的基因，彰显了藏族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质。



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，新疆始终是一片特殊的文化空间。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疆，也是文学叙事中反复出现的远方；它既关乎民族传统、草原文明，也映照着现代化建设和城市新生。然而，它也是日常的生活空间，是能够被书写为“身边”的日常，让人感受到家圆的温度与生活的细碎。更重要的是，新疆文学并非单一的“地域文学”，并非单一民族、单一声音的产物，而是一种多声部的共同体书写。艾青、王蒙、红柯、刘亮程、沈苇、李娟，以及一批民族作家们，共同构成了一个横跨民族、体裁和历史阶段的文学合唱——不同语言、传统与经验在这里相遇，汇成可共享的公共叙事。透过这些作品，我们能够看到：新疆不仅被写进一片风景，更被想象和确认为一个不断生成、可共享的共同体。

作为远方的新疆

王蒙的新疆岁月，是中国当代文学中“远方书写”的起点之一。1963年，他下放到伊犁，在那里度过了十余年。这段生活影响了他的写作气质。他坦言：“新疆扩大了我的视野，增进了我的生活经验。”在《这边风景》中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单纯的边塞风物，而是知识青年在困境中摸索意义的真实现场。小说里的“路”，既是迁徙的轨迹，也是心灵的朝圣之路。王蒙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路途与他人相遇、与生活碰撞，从而获得新的认知与归属感。对他而言，新疆从最初的“远方”变为塑造新自我的土壤。艾青把新疆写成了面向未来的“远方”。

在《年轻的城》中，他歌颂石河子的新生：“我到过许多地方/数这个城市最年轻……它的一草一木/都由血汗凝成。”在艾青的视野中，远方不是荒芜，而是国家现代化的前线，是青春与劳动共同铸就的未来。新疆在这里成为一幅正在绘就的现代化图景，带着建设的激情和理想。

红柯则以另一种方式回应“远方”，他的作品为新疆赋予了史诗与神话的维度，即时间意义上的“远方”。他笔下的新疆，是可以追溯到更深历史层面的“神话之地”。在《乌尔禾》中，他用“魔鬼城”的荒凉地貌折射出人与自然的搏斗；在《西去的骑手》中，远行者的背影几乎浓缩了整个西部的历史，既承载着族群迁徙的记忆，也映照出现代人灵魂的漂泊。红柯善于把现实经验与神话母题交织起来，使新疆成为“西部史诗”的舞台。红柯笔下的新疆，不仅是边疆，更是可以上溯至文明起源的时间始点，是现代人与祖先记忆对话的场域。

综观三位作家的作品，可以看到“远方”在三个不同维度上层层展开：王蒙的远方是“在路上”的体验，是与陌生的生活磨合、自我重塑的过程；艾青的远方是现代化的现场，是以青春和汗水书写的未来；红柯的远方是史诗与神话，是深埋在土地与历史中的文明回响。三者并非彼此割裂，而是互为补充：王蒙让远方有了切身的现实质地，艾青将远方推向理想与未来，红柯赋予远方厚重的历史纵深。正是在这三种叙事的交织中，新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方位，而成为个体经验与国家叙事、历史记忆与未来愿景交织出的精神坐标。



《在高原》，尼玛潘多著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，2022年12月

《透进病房的阳光》，尼玛潘多著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2022年12月

《紫青稞》，尼玛潘多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10年1月

积极进取、开拓创新的精神，是西藏发展的原动力。在漫长的西藏历史上，受藏传佛教观念影响，藏族民众知足常乐、顺势而为的思想较为常见。民主改革以来，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现代性进程的影响下，西藏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，尼玛潘多以文学之笔见证了西藏人民积极进取、开拓创新，建设美好西藏的景象。尼玛潘多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为改变现状而努力拼搏的人，他们见过外面世界的精彩，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。《紫青稞》中为过上更好生活而不懈努力的达吉姑娘、《在群山中穿行》中发展特色产业的网络达人阿旺次仁等，都体现了藏族进取创新的精神面貌。

尼玛潘多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而是有缺陷、有遗憾、有苦难的人生，可贵的是他们具有坚韧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，历经坎坷、挫折和磨难，对生活仍然充满热爱，人生的苦难淬炼了他们的意志，促成其自我成长。正是这种坚韧顽强的生命力，使得藏族民众能够在自然条件严酷的青藏高原生存下来。尼玛潘多并没有刻意拔高藏族人的这种精神，她以内视角展开思索：“当我用这样的视角，去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他们却将严苛的环境看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接受和接纳了如此独特的故乡，用达观的生活态度回应严苛的生

活环境。”进而摒除了“他者”的同情或神秘化西藏的观点。

尼玛潘多说：“我更愿意为基层人民写作，描述普通大众艰辛、勤劳却不乏欢乐和智慧光彩的生活场景，反映他们既坚韧顽强、淳朴厚道，又常常精明世故、斤斤计较的真实精神样貌，以及始终以真诚善良为底色的情感心理。”是的，尼玛潘多的创作有一种温暖的底色，她笔下的人物有人性的自私、狭隘、算计等缺陷，但宽容、善良是最重要的本质。

小人物与人性的探查

“文学是普通人个体生活细致的补充，所以我一直坚守写小人物。”小人物是尼玛潘多创作的关注点，她在创作中坚持人本主义的立场，平等质朴的生命观使她能用心聆听每个人的内心独白。她笔下的人物大致有青年人物系列，包括达吉、白玛措吉、琼珠、多扎、羊信玛尔琼、西绕维色等，以及中老年人，如加洛、央宗、次仁卓玛、阿妈曲宗、桑丹等。

尼玛潘多欣赏的是有独立意识、能把握自己人生命运的人，《紫青稞》中的达吉、《在高原》中的白玛措吉即是如此。《窗外青稞抽穗》中的西绕维色，大学毕业后几次考公未果，

里紧紧相连，远方的自然景观转化为身边的抒情意象。维吾尔族诗人阿布都哈里克·维吾尔在《不要忘记》中呼喊：“麻木不仁的人啊/不要忘记/你还有一颗跳动的心。”他把民族忧患与个体情感重叠在一起，不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一种日常的提醒：不要忘记生活的热烈和心灵的搏动。甚至王蒙的《这边风景》，虽然主题关乎宏大的时代，但其中也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耐心描摹。他写各族人民生活交织的日常，“婚丧嫁娶，从头到脚”。正是这些生活细节，将“远方”转化为“身边”。它不再是地图上的遥远之地，而是日常的生活温度与心灵共鸣。

多声部的合唱

如果说“远方”提供了精神坐标，“身边”带来了生活温度，那么新疆文学最独特的地方便在于，它不是单一声音的独奏，而是一场多声部的合唱。这里既有汉语作家的书写，也有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柯尔克孜族、塔塔尔族、锡伯族、塔吉克族、乌孜别克族等民族作家的参与。不同的语言、传统、经验汇聚在一起，让新疆文学呈现出一种“丰富的和谐”。正是在这种复调中，“远方”被转化为可抵达的生活经验，而“身边”又获得了更辽阔的历史与文化纵深。

在小说和纪实文学中，这种多声部特征尤为显著。何建明的报告文学《石榴花开》以纪实的方式书写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发展与普通人的个体命运，他通过普通劳动者的故事，让宏大的时代叙事转化为具体的生命质感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董夏青青的边防叙事，她关注边防军人和普通百姓

的交织生活。在她的笔下，边防既有家国意义的守护，也有普通人之间的情感依托。张者的兵团叙事则是另一种典型，《老风口》书写了新一代兵团人对父辈的记忆与理解，充满对兵团人艰苦岁月的追忆与反思，那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“远方”——陌生在于其与当下生活的时空距离，熟悉在于它已成为家族与个人成长中不可回避的身边历史。

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塔吉克族等民族诗人，则通过民族语言与意象，把辽阔与亲密结合在一起，让新疆大地成为日常的抒情对象。例如，克里木·霍加在《我热爱的新疆》中写道：“我的心在这片土地上生根/像胡杨一样在风沙中挺立。”胡杨、风沙，这些意象既是远方的象征，同时也是诗人及其族群生存日常的写照。

民族作家的双语互译和出版实践，也为新疆文学的多声部增添了独特层次。哈萨克族作家乌拉孜汗·阿合买提在《八十号大院》中，将哈萨克语谚语和意象融入汉语小说叙事，把草原文化的逻辑和节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系统中。这种写法既保留了民族传统的独特性，又在汉语文学的语境中获得新的共鸣。类似的尝试也出现在阿吾列罕·哈里的散文中，他在哈萨克语与汉语之间自由切换，让牧场生活既是族群内部的“身边”，也是全国读者可以进入的“远方”。

正是在“多声部”的交织中，新疆学生生成了一个可共享的空间，建构出了一种深刻的、不断生成的、彼此可理解可共鸣的共同体。

(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传统学院副教授)